

庶民女性发声与遮蔽——《生死场》葛浩文英译研究

刘溪涓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DOI:10.61369/EST.2026020025

摘 要： 本文借助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为框架，考察葛浩文《生死场》英译本中女性声音的传递状态。采用文本对比分析法，剖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对庶民女性声音的影响。研究发现，译本一方面通过直白呈现女性身体苦难，使庶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得以彰显，另一方面又因追求英语流畅性对庶民声音进行了规训。研究揭示了跨语际翻译中庶民女性声音的复杂性，为文学翻译中的女性话语研究及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参考。

关 键 词： 《生死场》；葛浩文；斯皮瓦克；庶民研究

Voicing and Silencing of Subaltern Women—A Study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Liu Xi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Abstract： Framed by Spivak's postcolonial feminist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mission of women's voices i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Through 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is, it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ffect the voices of subaltern women.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the translation brings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subaltern women to light through the direct presentation of female bodily suffering, it simultaneously disciplines those voices in its pursuit of English fluency. The study reveals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subaltern women's voices in cross-lingual translation, offering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women's discours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Keywords：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Howard Goldblatt; 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引言

萧红《生死场》以东北底层女性为书写核心，其对于庶民女性话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构成了重要的学术探讨空间。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指出，第三世界庶民女性身处双重霸权下失语，而翻译作为话语权力博弈场域，直接影响其声音的传递。当前学界围绕葛浩文《生死场》英译本已积累一定成果：张世娇、谭雪等学者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动态呈现，林攀龙等学者聚焦译本审美意识的重构。然而现有研究仍有不足，多聚焦译者行为描述或译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和文学性，研究尚未以后殖民女权主义为核心，深入剖析庶民女性声音的跨域际传递细节。而翻译本身即是一种权力介入，这一视角的缺席，意味着我们对译本中的性别话语讨论仍停留在表层。本文以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理论为支撑，提出“葛浩文译本如何传递《生死场》中的庶民女性声音”这一核心问题，采用文本对比法，对比原文与译文的女性苦难书写，剖析译者策略对庶民女性声音强弱的影响，以期弥补现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为后殖民翻译理论提供新的案例支撑。

一、何为庶民研究

要探讨《生死场》译本中的女性声音，首先需要界定“庶民”的内涵。在斯皮瓦克的语境中，庶民所指的并非特定的人，而是指“subalternity”（庶民性、庶民处境），即那种从结构上阻断了边缘群体向上流动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机制。斯皮瓦克

的“庶民研究”勾勒出庶民经验被遮蔽的踪迹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分析范式，她深刻指出：“within the effaced itinerary of the subaltern subject, the track of sexual difference is doubly effaced.”^{[1](P41)}，“If, in the context of colonial production, the subaltern has no history and cannot speak, the subaltern as female is even more

基金项目：东北林业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资助项目“全球史观下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翻译活动的多维研究”（项目编号：S202510225005）。

作者简介：刘溪涓（2005—），河南三门峡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

deeply in shadow.”^{[1](P257)} 这一论述揭示出问题的关键，庶民的问题不在于能否开口言说，而在于其言说始终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所否定。由精英主导的社会结构根本无意聆听或认可他们，这使得他们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承认。

斯皮瓦克同样高度关注翻译问题，将其视作后殖民语境下话语权力博弈的重要场域。在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一文中，她指出西方译者往往因片面追求目标语的流畅，而刻意抹杀原文本的差异性和反抗性。最终将第三世界女性的声音被同质化为符合西方新殖民主义凝视的“他者”^[2]，这一观点为剖析文学翻译中的跨语际话语规训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参照。以此为理论依据，本文将考察葛浩文英译本如何处理《生死场》中的女性声音。

二、《生死场》及译文中女性的发声

（一）女性身体与苦难声音的强化

在葛浩文的译本中，那些最触目惊心的女性身体书写与苦难场景，因其强烈的冲击力而被完整保留，甚至得到进一步强化。萧红笔下庶民女性的存在状态，由此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

正如巴微在阐释斯皮瓦克理论时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妇女“处于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男权主义等种种压力彼此缠绕，共同沉积在第三世界女性群体的文化记忆中^[3]。萧红笔下的月英、金枝、王婆正是这类处于多重边缘的代表，她们在原著中已是被多重压抑的失语者。葛浩文对她们身体苦难的直白呈现，恰恰使这些最底层的女性在跨文化传递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

例1：借着火盆边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4](P36)}

She held it up close to the fire to see what they were. Maggots. Yueying's buttocks were rotting away, infested with maggots. The rest of her body, too, would soon become caves for the little maggots.^{[5](P34)}

萧红笔下的女性身体，既是小说意义生产的核心场域，又是文本获得内涵与意义的根本来源^[6]。在原文中，月英的身体被书写为被动的、逐渐丧失人形的存在，她的声音早已被剥夺，甚至求死的愿望都无法实现。而葛浩文没有对“maggots”“rotting”“caves”等令人不适的词汇做任何雅化处理，而是直白地呈现月英身体的物化过程。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恰恰成为月英作为庶民处境的象征，即她的身体遭受疾病侵蚀、被丈夫遗弃、最终成为“小虫们的洞穴”，以最直观的方式进入英语读者的视野。月英无法“说话”，但她的身体在腐烂中“发声”了。

例2：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4](P 48)}

The naked woman, like a fish, lay sprawled there ... The pregnant woman with her bulging belly sat in silence, her body drenched with cold water. She dared not to move a muscle, for,

like the child of a particularly society, she lived in dread of her man ... She was not allowed even a single moan.^{[5](P44-45)}

萧红书写女性苦难时，最核心的修辞是将女性的生育和生存状态与动物相类比。在原著中，诸如“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4](P37)}的基调贯穿始终。葛浩文在处理这些将女性身体“动物化”的描写时，极度贴近原文本。“naked woman, like a fish”将人与鱼的并置，暗示女性的物化，保留了这一对女性物化的尖锐批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he was not allowed even a single moan.”也将原文的禁令精确传达。译文完整保留了女性在绝望中的内心独白，这种对死亡的渴望，恰恰是对生之绝望的最有力的控诉。女性的呻吟被禁止，但她们的绝望通过译文的直白呈现，反而被放大了。

例3：金枝完全摆在男人怀中，她不是正音嘶叫：“对不起娘呀！……对不起娘……”^{[4](P 90)}

Jinzhi was now completely in the man's arms, wailing in a voice that wasn't her own: “I've let Mother down! ... I've let Mother down ...”^{[5](P64-65)}

这是原文中最令人震撼的段落之一。原文“不是正音嘶叫”被葛浩文译为“wailing in a voice that wasn't her own”，金枝的声音发生了变异，它不是主体性的表达，也不是正常的人际交流。因为这不再是言语，而是嘶喊，而且这声音不是自己的。译文精准捕捉了庶民女性在极端压迫下声音的扭曲状态，她说话了，但说的是“对不起娘”，愧疚感已经完全内化为她唯一能发出的语言。因为金枝不是控诉施暴者，而是向母亲道歉。她嘶叫了，但这声音已经不属于她自己。斯皮瓦克所说的“庶民不能说话”，在此处得到了最精确的翻译呈现，金枝在发声，但她的声音已经被权力结构扭曲。

（二）英语霸权对庶民声音的弱化

萧红想深入国民心灵的深处，以底层女性的苦难书写为沉默着发出警示。^[7]然而，当这些粗粝、断裂、充满反抗性的庶民声音进入英语世界时，葛浩文对流畅可读的追求，却可能构成另一种形式的规训。因为葛浩文本人曾明确表示，在“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中，雅是最重要的，甚至将其排序调整为“雅、达、信”。^[8]问题在于，这种规范化是否不可避免？斯皮瓦克所呼吁的“译者之爱”，恰恰要求译者抵抗这种规训，尽力保留原文本的差异性。以此为标准，葛浩文的一些选择便值得商榷了。

例1：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4](P4)}

She sounded like a pig when she spoke. Maybe she had a porker's vocal cords, for the sounds she made were definitely pig noises.^{[5](P7)}

原文将麻面婆的说话直接等同于“猪声”，并推测其“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这是一种对庶民女性声音的极端物化书写，但同时也构成了独特的文学表达形式。麻面婆的声音本就不是言语，而是无法被纳入正常交流的“噪音”。译文虽然保留了“pig”“porker's vocal cords”等意象，但将原文的叙述转化为一种更合理的因果说明，“sounded like a pig when she spoke”比原文的直接并置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问题在于，麻面婆声音的“非人”特质，在译文中是否被合理化了？这里触及了语言可译性的边界问题，当原文中的语言在目标语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

表达时，译者所谓的合理化处理并非完全正确。

例2：她哭抽着，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但她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4](P6)}

Racked by sobs, she went outside to bring in the clothes that were drying in the sun; she was too preoccupied to notice the goat.^{[5](P9)}

麻面婆的哭被描述为“哭抽着”，这是一种断续的、无法自制的哭泣。而任意则指向一种麻木的、机械的身体惯性。她在哭泣中仍在“搭衣裳”。译文用“racked by sobs”和“too preoccupied to notice”来呈现这种状态。从字面意义上看，译文似乎无误。但“racked by sobs”是英语中常见的表达痛苦的习语，而“哭抽着”在原文中是一种更具体的、带有方言色彩的描述。更重要的是，麻面婆在哭泣中仍在劳作。这种庶民女性连哭泣都无法专心的生存状态，在译文中被“preoccupied”一词赋予了某种主动选择的意义，即麻面婆“专注于”收衣裳，而原文的“任意”更接近一种麻木的、机械的身体惯性。庶民女性的情感表达，在译文中被合理化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有动机的行为。

例3：“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了，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个废物……那天早晨……我想一想！……早晨，我把她坐在草堆，我去喂牛；草堆是在房后。等我想起孩子来，我跑去抱她，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我看见草堆下有铁犁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恶兆，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我以为她还活着呀！等我抱起来的时候……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4](P8-9)}

“The child was three when I let her fall to her death. If I’d kept her, I’d have been a wreck. That morning …let me think … yes, it was morning. Anyway, I left her on the haystack when I went to feed the cow. Our haystack was behind the house. When I remembered the child, I ran back to get her. But she wasn’t there. Then I saw the handle of the pitchfork under the haystack, and I knew that was a bad sign. She’d fallen right on top of it. At first I thought she was still alive, but when I picked her up … aah!” … That year we had a fine harvest. I brought the wheat in and then picked all the grains up from the threshing floor.”^{[5](P24-25)}

萧红笔下的农妇往往处于一种半失语状态，她们的言说方式

破碎、跳跃，往往缺乏明确的逻辑连接。例如王婆在讲述自己死去的孩子时，原著的语言是颠三倒四、情绪先于逻辑的。葛浩文这里采用了归化翻译，虽然极大地降低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但却导致了深层的文化流失。原文本中那种因无知、绝望而产生的结巴与错乱消失了，她们变成了操着流利西方话语的受难者。这种语言的平整处理，实质上消解了庶民的真实声音，印证了斯皮瓦克关于“强势语言会同化弱势者声音”的担忧。正如戴学德在阐释斯皮瓦克“三层结构”时所指出的，逻辑是“显明的、字面上的”，而修辞则“创造了逻辑意外的意义”，是“抗拒性”的；缺乏发言权的人群恰恰需要通过“修辞的操纵”来“扰乱或挑战”不公正的现状。^[9]

从斯皮瓦克的视角审视葛浩文的《生死场》英译本，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忠实或背叛。一方面，译文对女性身体与苦难场景的直白呈现，使得萧红笔下庶民女性在多重霸权夹缝中的存在状态，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另一方面，译文对流畅可读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对庶民声音的规训。庶民女性被看见了，但她们的声音能否被真正地听见，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结语

探讨庶民声音的强弱，最终要落脚到翻译的受众与目的。萧红写作《生死场》时，以平视乃至内聚焦的视角来书写底层女性，意在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乡亲代笔。葛浩文的译本，其预设读者是英语世界的学术圈与普罗大众。在20世纪末期欧美学界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语境下，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政治控诉。葛浩文作为文化桥梁的搭建者，必须在“保留异国情调”与“符合西方阅读习惯”之间需求平衡。

“庶民女性能否在翻译中说话？”《生死场》的英译本给出的答案是复杂的。她们确实发出了声音，但这声音是借由主流的、规范化的语言得以表达的。葛浩文的翻译确实让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被世界看见，这种“看见”本身已是跨文化传播中弥足珍贵地开端。但与此同时，他的译本也提醒我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我们试图跨越文化差异去理解另一个世界时，那些最底层、最微小的声音，是否真的能够被原原本本地传递过来？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是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者需要持续追问的。

参考文献

- [1] MORRIS R C, ed.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SPIVAK G C.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M]//BARRETT M, PHILLIPS A,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7-200.
- [3] 巴微. 女性主义视域中斯皮瓦克理论的价值与意义[D].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 [4] 萧红. 生死场[M]//萧红. 萧红文集: 小说Ⅰ.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21.
- [5] Xiao Hong.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Tales of Hulan River[M]. Howard Goldblatt, trans.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2002.
- [6] 林幸谦.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J]. 南开学报, 2004, (02): 100-110+124.
- [7] 贺莉莉. 《大地》和《生死场》的女性主义比较研究[D]. 长沙理工大学, 2011.
- [8] 同怡恂. 葛浩文. 文学翻译: 过程与标准——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14, (01): 193-203.
- [9] 戴学德. 论《翻译的政治》中的修辞与伦理观[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